

清廷戊戌朝变记(外三种)

QINGTING WUXU CHAOBIANJI

(清) 苏继祖 梁启超 袁世凯 陈庆年◎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廷戊戌朝变记：外三种 / (清) 苏继祖等著. —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8.10

(戊戌前后的痛与梦)

ISBN 978-7-5633-7772-5

I. 清… II. 苏… III. 戊戌变法 IV. K25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51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)
(网址：http://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金山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)

开本：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：4.25 字数：71 千字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~5 000 册 定价：1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今年(2008)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。一个自信的民族,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。

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,在这个年份里,奥运会在中国举行。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“胜利”,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。无可疑义,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。但是,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,我们也可以说,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。——在这样一个日子里,回望一下“戊戌”,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。

在此,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,把它们重新刊印,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。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: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,它至少与马关和谈(1895)和庚子国变(1900)一起,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。因此,我们选取的旧籍,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,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。

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,它们是:《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》、《劝学篇》、《庚子西狩丛谈》。

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。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,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,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。——读了这个东西,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。只有了解历史,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。也就是说,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,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。

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直到戊戌变法开始,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(大约两年)。这时期的典型标志,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,其次是近代性传媒(报刊)的爆炸式的产生,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。而戊戌变法,正是这场思想解放

的一种成果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，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《劝学篇》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：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，一方面，是少数“精英”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；另一方面，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。在这两个界面中，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。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：在变法期间，《劝学篇》印制的数量，约两百万册，而康、梁的那些观念，则并不普及。——这正是我们选取《劝学篇》的理由。

庚子国变（与此相关的概念，是“义和团”和“八国联军”）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，但至此，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。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。《庚子西狩丛谈》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，也是实录，所以我们选取了它。

这三个选择，可能有点另类，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。我们的工作在于：三个文本，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，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。比如说，《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》我们采用了《中日战辑》、《东方兵事纪略》等文献作为参照；《劝学篇》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“上皇帝书”等作参照；《庚子西狩丛谈》则采用了《庚子国变记》与《拳变余闻》作为参照。我们希望，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。

这三项之外，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，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。一部是梁启超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，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《新纪元》。这两个文本，透射出的，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，有极大热情，又有极大局限。这在今天看来，是有启发的。

上稟出版之衷。是为说明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 2008年10月识

目 录

清廷戊戌朝变记 苏继祖 / 1

序 / 3

戊戌朝变纪闻 / 6

跋戊戌朝变记后 / 38

戊戌政变纪事本末 梁启超 / 41

百日维新 / 43

政变正记 / 55

戊戌日记 袁世凯 / 61

序 / 63

戊戌日记 / 65

自书戊戌纪略后 / 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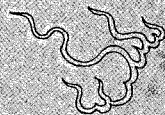
跋 / 75

戊戌己亥见闻录 陈庆年 / 77

光绪二十四年戊戌(1898年) / 79

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1899年) / 113

清廷戊戌朝变记



苏继祖

苏继祖(1864—1933),字季培,江油县河西乡人。举为拔贡,选任甘肃省敦煌县教谕。原配亡后,续娶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长女为妻,杨荐其为湖北总督府幕僚。为总督张之洞派往日本国考察财税制度,并委任以湖北省樊口税捐委员。杨锐遇难后,举家返乡闲居。民国初,任彰明县视学、县征收局长兼县办“中国文学院”院长。晚年自号凿空道人。

序

呜呼！古今痛心泣血愤懑惋惜之事，尚有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者乎？溯自通商五十年来，割地失权，耗财受辱，日甚一日，迨至甲午以后，强邻环逼，国势日危，岌岌乎不能自保，而肉食谋国者仍自泄泄沓沓，苟全富贵于目前。幸有我皇识微鉴远，奋图富强，十年积虑处心，一朝锐意行之，薄海臣民，欢腾鼓舞，莫不谓转机可望，将来洗我耻辱，卫我生民，保我土地，皆发端于此际也。虽云其间措置未全周密，操之不免过急，然究其为国为民之诚，通时达变之智，举朝王大臣中，曾有一人否？况宫阙深邃，囿于见闻，高拱如我中国皇帝乎？

不幸皇天不佑，祸起萧墙，在廷守旧诸臣，既惮上之英

明，切实任事，又恶新政扞格，不便于私；假公济私，群相纠合，以谮诬我皇上于素有嫌隙之皇太后前。以结党密谋，将不利颐和园，激太后之怒；以变乱成法，众心不服，悚太后之听；以联外夷，惑邪说，动太后之疑惧。太后与皇上本不相能，大都小人取宠离间之故。若有二三明大义、识大体、公忠正直之大臣撮合其间，使太后知皇上人已归心，并非人人怨谤，则遇皇上必慈，皇上感太后之宽仁，则事太后必顺；痕迹化于外，成见释于心，两宫和睦，社稷苍生之福也。即不然如恭邸乙未年匡救废立于初萌，亦不至决裂如此。

然推之太后之心，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，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，至法当变不当变，未必有成见在胸也。不过明目达聪，仅寄见闻于诸王大臣，以为诸王大臣皆曰贤，即天下皆曰贤矣；诸王大臣皆曰可杀，即天下皆曰可杀矣。今见皇上锐意变法，而赴愬失德者，纷来哭诉，无道者日至，则当初暂假事权之美意，激成骄敌纵恶之机心，故以为非废立皇上，逐杀新党，一概归复旧制，不足以安天下之心，不足以存宗社之守，于是有八月初六之变焉。（按：慈禧有术无学，为大事却囿于数人耳目，所以前有戊戌变政，后有庚子祸乱，王小航早已论定其人矣。）

惜乎我皇上为国为民之心也！惜乎我皇上竟能自强变法也！千载难遇之机，乃败于利己误国、因小失大、谗佞

庸奴之手。抢地呼天，莫可奈何。当时中外耸听，舆论纷纭，外人耽目，清议倡言，要不免于似而非，既加之腹撰，非过之即不及也。兹将数旬访询，反复考核，采之都中上下口吻，证之京津先后见闻，自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，每日章奏谕旨繁多，已有各报书详记矣，兹不复赘，惟记有关我皇上被祸之由，特详记之以补各报之阙，笔之中简，以俟有心时事者考证焉。

戊戌朝变纪闻

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三日，下诏定国是，行新政。

自甲午乙未兵败，割地求和偿款，皇上日夜忧愤，益明中国致败之故，若不变法图强，社稷难资保守。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，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改，夷法不足效，屡言而驳之，上愤极，往往痛哭而罢。惟大学士翁常熟近年省悟大局，非变法难以图存，前曾拟变法诏勅十二条，商及恭邸，为恭邸阻之。有与翁不和者，暗中潜于太后，谓翁取悦于皇上，妄思改变成法，此肇乱之道，恐其蛊惑皇上，宜早防范。翁之前此出毓庆宫，即因此也。

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，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，每为皇

上讲述，上喜闻之，不时召见。其为人虽无足取，然启诱圣聪，多赖其力。朝中守旧诸大臣皆忌之，呼翁为老奸巨滑，呼张为汉奸。至廿三年冬，德人占据胶州，上益忧惧，至今春，乃谓庆王曰：“后若仍不给我事权，我愿退让此位，不甘作亡国之君。”庆邸请于太后，始闻甚怒，曰：“他不愿坐此位，我早已不愿他坐之。”庆力劝，始允曰：“由他去办，俟办不出模样再说。”庆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，于是商诸枢臣，下诏定国是。

四月二十四日，太后召见庆王、荣相。（说为陵工事，不知尚有他事否？）

四月二十五日，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、刑部主事张元济，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。

上年冬，德人占胶州，康有为来京上言，极言事迫万分，亟须变法自保。上览奏，欲召见面询，为恭邸阻以成例，四品以下不得召见，命大臣询问代奏可也。上从之，令总署王大臣详细询问变法大计，并令告知，如有陈奏事件及著述书文，即由总署代陈，勿许阻难。此正月初间事也。至四月，恭邸薨，上始得与翁常熟一德一心，商办变法事宜；又值太后许假事权，故敢下诏定国是，召见康有为焉。

正月，康初上之书呈于太后，太后亦为之动，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，变法条理，曾有懿旨焉。否则王大

臣未见，未虚心下问也。是日太后又召见庆王、荣相、总管内务府王大臣等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，朱谕罢大学士翁同龢。

翁为皇上二十馀年之师傅也，谊甚亲密，自醇贤亲王薨逝后，益与之亲切；上之操危虑患，翁亦俱能仰体。现虽罢其毓庆宫，仍在枢廷行走，可以日近天颜。自甲午之后，阅历时艰，恍然于强弱存亡之所在，近日辅翊皇上，筹画新政，仅其一人；曾保荐康有为，才堪大用，甚为满朝忌而恶之。当康去冬来京上书时，有守旧之大员于元旦密告恭邸曰：“康有为此来，闻是翁、张所引，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，亟宜防备之。”恭邸阻见康有为者，盖有先入之言也。近见恭邸薨逝，康复见用，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，乃极力排挤谗谤皇上及康也；因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，未便即行钳制，故于未见康时，先去翁以警之。是日谕旨三道，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。皇上奉此谕后，惊魂万里，涕泪千行，竟日不食。左右近臣告人曰：“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镇物了。”

又召王文韶迅速来京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荣禄暂署。

四月二十日后太后召见庆邸、荣相、刚相，询及皇上近日任性乱为，要紧处汝等当阻之。同对曰：皇上天性，无人

敢拦。刚伏地痛哭，言奴才婉谏，屡遭斥责。太后又问，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，也不商之你等？荣、刚皆言曰：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。刚又哭求太后劝阻。太后言，俟到时候，我自有法。此时军机大臣恭邸薨，礼邸病，刚暂领衔，自此气焰日炽矣。

翁既罢，太后意令荣相入值枢廷，力辞，并谓去一汉员，仍宜补一汉员，太后改用王制军。荣相自求北洋大臣，意在揽握兵柄，且目中久已蔑视皇上，今更不满意于变法，借此可远避之。并与太后密商，以皇上任用匪党，难保日久不生变乱，京津咫尺，以北洋陆军可资镇制，太后深谓然。即日请训，太后连日召见赏膳，午后召对，密语甚久，皇上心甚疑惧。

缘荣相与皇上久不相能，其无君神情，每见于面，上深恨之，又以太后所喜，畏不敢言；以前媒孽诸端，上亦有所闻，继见连天召见密语，益疑之。而荣相却早已商请太后垂帘，今将出京，又再三恳请。太后曰：“非图安逸，恐又招揽权之讥。”荣对曰：“揽权者，臣下之谓也，非所谕于太后。明事人断无是言，不明事者何足重轻。”荣曾于皇上决意变法之时，四月初间，遍邀王公大臣，联衔恳请训政，又命貽穀邀致讲读翰詹等官，李盛铎、杨崇伊邀致御史，皆联衔吁恳，兼参劾康有为辩言乱政，私立保国会，白日集聚千人，

举国骇然。奈人各一心，奔驰数日不果。其必欲联衔入奏者，亦太后示意也。

荣相久已蓄志北洋，近数月以来，于北洋将士加意笼络，于袁、聂、董三军尤甚。

荣有世交，以知府分发直隶，曾托王制军照拂，荣告以不必忙，王夔石亦太猾，少待数月，或在我到北洋云云。此丁酉冬月事，可见荣早有成见也。

恭邸初薨，太后欲往天津阅兵，皇上谏止，太后甚怒其阻挠，此举荣相迎合者也。据云连日召对，所商即游览天津之事，此说甚合。尚有人说，此亦荣属人奏请者，盖以阅兵为名耳。

又召京外二品以上大员，俱着具折，诣太后前谢恩。

又张之洞着无庸来京。

甲午正月，有内务府大臣某，私诣太后前碰头，上斥其不懂事。盖既归政，凡大臣遇太上皇皇太后有赏，应由皇上代奏谢恩，示尊崇也，太后反疑皇上禁制。近日与亲信大臣言及，深恨皇上监制于己。某大臣乘便言到康有为蛊惑乱政，大小臣工，竟有附和求荣者，臣深虑之；太后不肯垂帘，亦须接见臣下，以制其妄为之心，否则日久更无忌惮，彼时恐太后收笼不住。太后然之，故有是诏。

南皮张制军，久矣简在帝心，自甲午权署两江，更信重

之，欲召入辅政，为翁相国、孙莱山尚书所阻；本欲以两江久任之，乃本任刘公，内则贿结宦寺，外乞援权贵枢臣，屡为刘公请旨回任，上迟疑不允，竟以懿旨压制皇上，而回任焉，上至今犹恶之。今春上既决意革故图新，乃召张公来京，辅翊新政。守旧大臣，恐张异己，百计阻挠，得借沙市教案，令回两湖本任。时人多惋惜之，以为得张公入朝，其声望才德，足以制服康、梁，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。

窃谓为惜张公未来之说者，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。张之未能到京，正天之所以福张公，或有待于将来也。独不见翁常熟、张侍郎、陈中丞乎？当太后许假皇上事权之日，已有深意存焉，况媒孽者日伺其间，一张公之力何能补救于万一，徒自取祸耳！于我皇上及一切新政又何益焉。闻直督裕公入值枢垣，因未敢如众人之拂忤皇上，曾恭奉新法之诏，竟不见容于朝，遂使出督直隶，夺其事权，以为异己不逆君者戒。使张公入朝，能于新政一扫而摈之乎？必曰不能。不能则不见容矣。请观八月以后，一概回复旧制，可想而知。举朝之行事用心，于此等处，宜体会之。

有至交某问于余曰：“张制军非首开风气者乎？何戊戌八月以后，不一言及朝政之失，无怪各报纸毁之甚也。”余因作《读苏文忠〈大臣论〉书后》以示之，且告之曰：“自戊